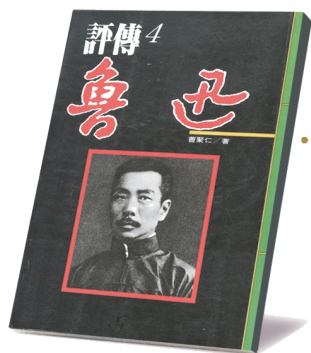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堪稱知己的史家之筆——



重讀曹聚仁《魯迅評傳》

◎ 文字工作者／蔡登山

魯迅評傳
曹聚仁著/天元
7701/220元
平裝

1933年的冬天，魯迅在曹聚仁家中作客敘談時，他發現曹聚仁有爲他作傳的準備，他問：「曹先生，你準備替我寫傳記嗎？」，「我是不夠格的，因爲我不姓許」，曹聚仁笑著回答。這裡講的「姓許」，是指魯迅的五位姓許的知己朋友，即許壽裳、許欽文、許季上（許丹）等三位男性和許廣平、許羨蘇等兩位女性。後者爲許欽文的妹妹，人們曾以爲她是魯迅的未來夫人。魯迅聽後便笑著和曹聚仁說：「就憑這句話，你是懂得我的了。」兩年多後，魯迅去世了。曹聚仁爲了不辜負魯迅的期望，他和夫人鄧珂雲就把收集到的有關魯迅的史料，加以整理，準備動手寫魯迅傳記。那知次年就發生「八一三」淞滬戰爭，曹聚仁投入抗戰行列，自然無暇顧及魯迅傳記的寫作，只好在1946年由上海群眾雜誌公司出版，由鄧珂雲輯、曹聚仁校的《魯迅手冊》。

而在此後的數十年中，魯迅傳已被別人捷足先登了。先是有鄭學稼於1942年7月由江西勝利出版社初版、1978年在臺北增訂再版的《魯迅正傳》。後又有王士菁寫於四十年代末的《魯迅傳》（1948年1月上海新知書店出版）。前者大約是鄭學稼在1939年在重慶北碚附近

寫的，當年他年僅32歲。他以當時「單獨地一貫地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」而感到自豪，足見該書是以反共爲主旨，並非嚴肅的學術著作。名爲「正傳」，其實資料極爲粗疏，尤其是附錄的〈兩個高爾基不愉快的會見〉，完全是作者人爲安排或創造的，因此後來曹聚仁在《魯迅年譜》中「罵」該書是「胡說八道」，可說是一點也不爲過。至於後者雖然許廣平在序中喜悅地說：「勝利之後，有機會看到這本真正由國人寫的《魯迅傳》。他把中國歷史發生的重要事件和魯迅生平經過，從頭正確地、客觀地尋找出它的所以然。惟其如此，才能瞭解魯迅行文、處世的真意……。」然而由於時代環境的限制和作者的年輕、學力的不足。因此曹聚仁認爲作者「無論史才、史識、史筆，都是不夠格的，只寫了一部亂糟糟的傳記。」

在曹聚仁認爲，這些爲魯迅作傳的人，都沒見過魯迅，都是憑自己的猜測在曲解魯迅，而和魯迅交往頗深，最適合寫魯迅傳的人選，如許壽裳、孫伏園、周作人，雖也寫了許多回憶的資料，但卻只是傳記史料而非傳記本身。許廣平對魯迅的生活瞭解最多，尤其是最後的10年，但曹聚仁懷疑其作傳之能力。曹聚仁和孫伏園一樣，後來都把希望寄託在林辰身上，可是林辰卻只熱心於魯迅的事跡考證，他寫了《魯迅事蹟考》於1948年7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，仍不見魯迅傳的出版。魯迅傳的難



以問世，曹聚仁在《魯迅評傳》的〈引言〉中說，一是魯迅的言行，「並不符合士大夫的範疇的，所以畫他的都不容易畫像他」。二是有人「要把他當作高爾基捧起來，因此，大家一動筆就阻礙很多，連許廣平也不敢講真話」。

曹聚仁在〈我與魯迅〉文中說：「我之於魯迅先生，並不想謬託知己，因為他畢竟比我大了20歲。我雖不會受他的教誨，不是他的學生，在上海那一段時期，往來得相當親密。」。在此「謬託知己」是曹聚仁的自謙之詞，其實以當時他和魯迅的交情，可說是「堪稱知己」。我們知道曹聚仁的初識魯迅是在1927年的12月21日。當時魯迅被邀至暨南大學演講，曹聚仁為他作演講記錄，後來該記錄冠上魯迅自訂的標題：〈文藝與政治的歧途〉，刊於12月26日上海《新聞報》的副刊〈學海〉上。（1934年10月，楊霽雲為魯迅編《集外集》時，魯迅將這篇演講稿略作了些修改，由曹聚仁介紹到群眾圖書公司去出版。）兩年後，他們在「內山書店」又有一次意外的相逢。而到了1931年8月，曹聚仁創辦了以烏鴉為標記的《濤聲》周刊，得到魯迅的支持。魯迅第一回用羅撫的筆名寫了〈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一寄《濤聲》編輯的一封信〉，糾正周木齋指責北平大學生從故都逃難的謬誤，曹聚仁與《濤聲》的同仁看出是魯迅的筆調，編發此稿後，又請魯迅繼續給《濤聲》寫稿。魯迅回信說：「先前也曾以羅撫之名，寄過一封信。」1933年9月11日《魯迅日記》載：「曹聚仁邀晚飯，往其寓，同席六人。」這是曹聚仁首次請魯迅的家宴。1年後的9月13日，魯迅又在日記上寫著：「晚曹聚仁招飲於其寓，同席八人。」

除此而外，1933年曹聚仁曾為出版李大釗的《守常全集》而請魯迅作序。魯迅欣然應

命，寫了《守常全集》題記，還為使書能順利出版，提供了寶貴的意見。可惜的是這部書稿在當時沒有能出版，魯迅對此頗有微詞。但此是怪不得曹聚仁，因為書稿一直在周作人手中，兩年後的1935年2月9日曹聚仁在給周作人的信中還在催稿。但這事終究是落空了，不知是否是曹聚仁無意捲入周氏兄弟的矛盾漩渦之中？直到1939年《守常全集》才由蔡元培作序，並以北新書局託名為社會科學研究社出版，那時魯迅已逝世三年了。1934年夏天，曹聚仁與陳望道、夏丏尊、葉聖陶、徐懋庸、金仲華、陳子展等七人，提倡大眾語，反對汪懋祖的復興文言，也反對林語堂的語錄體，在《申報·自由談》和《社會日報》各報刊展開論戰。曹聚仁向魯迅徵求意見，魯迅立即在1934年8月2日寫了〈答曹聚仁先生信〉。接著又應曹聚仁的請求，寫了〈門外文談〉，發表於同年8月24日至9月10日的《申報·自由談》。這是大眾語運動中最有力的文字，對大眾語運動作了建設性的支持。而在曹聚仁和陳望道所辦的《太白》半月刊及與徐懋庸合辦的《芒種》半月刊，都配合魯迅與林語堂的論戰，魯迅也在這兩刊物上發表過文章，有時曹聚仁的文章，魯迅覺得意猶未盡，還可深化，就續寫一篇。魯迅的〈徐懋庸作《打雜集》序〉、〈從「別」字說開去〉等雜文，都是在《芒種》上發表的。

另外我們翻查《魯迅日記》，發覺魯迅給曹聚仁的信共有43封，保存下來的只有25封半，其中寫於1933年9月7日的信，是鄧珂雲根據家中的一塊鋅版手跡抄錄下來的。

對於曹聚仁為魯迅作傳一事，學者古遠清就認為「曹聚仁不單純是作家，而且還是史學家，又做過近20年的新聞記者。再加上他和魯迅交往甚密，魯迅是和他同桌吃飯、一室閒



談的文友，他本人又十分尊敬魯迅，所以由他來作傳，未必不是合適的人選。至少他不會去相信一些有趣的推想和神話般的玄談，更不會按誰的旨意去圖解。」

曹聚仁的《魯迅評傳》，1956年由香港世界出版社印行。該書分29節，除「引言」外，依次為：紹興—魯迅的家鄉、他的童年、少年時代的文藝修養、在日本、辛亥革命前後、民初的潛修生涯、托尼學說、《新青年》時代、在北京、《阿Q正傳》、《北晨》副刊與《語絲》、南行—在廈門、廣州九日、上海十年間、晚年、《死》、印象記、性格、日常生活、社會觀、青年與青年問題、政治觀、「魯迅風」—他的創作藝術、文藝觀、人生觀、他的家族、他的師友、閒話。其中第1節至第17節基本上按魯迅生平活動的階段為主線，展示傳主的心路歷程和創作業績。第18節至29節，則從社會觀、政治觀、文藝觀、人生觀諸方面介紹傳主的思想、性格、社會關係乃至生活細節。由於曹聚仁有史學研究的功底，既能鑒別史料，又能組織史料，因此他是有條件可以寫出比較合理近情的魯迅傳記。不過曹聚仁也承認他無法成爲一面鏡子，他並沒有十足把握反映出魯迅真實的形象來；他自以爲很公正的批判，也許表達的卻是他的偏見。在這一方面曹聚仁倒有自知之明的。

曹聚仁在書中開頭就回憶他與魯迅的對話，魯迅問：「曹先生，你是不是準備材料替我寫傳記？」曹聚仁答：「我知道我並不是一個適當的人，但是，我也有我的寫法。我想與其把你寫成一個『神』，不如寫成一個『人』的好。」接著，曹聚仁推崇路特微喜（Emil Ludwig）撰寫的耶穌傳記。在路特微喜筆下，耶穌是一個常人，但不失其偉大。曹聚仁表示要以這部傳記作爲楷範，正視魯迅思想上

的矛盾，而不是把這些矛盾掩蓋起來，或加以曲解。這也是曹聚仁在1967年出版的《魯迅年譜·編者小言》時，又一再強調的「把魯迅當作有血有肉的活人來描畫」。這與大陸諸多研究者，在長期流行的「左」的思潮下，總認爲魯迅是完美高大的「民族英雄」、「聖人」，容不得對魯迅有局限、有失誤的議論和看法。在曹聚仁筆下，魯迅是一個認真的人，一個有趣的人，一個廉介方正的人，一個值得尊敬的人。他最大的貢獻，在於解剖中國社會。是一位冷靜暴露中國社會黑暗的思想家。他的風格，一方面可以說是純東方的，有著「紹興師爺」的冷雋精密；另一方面又可以說是純西方的，有著安特列夫、斯微夫托的辛辣諷刺氣息，和尼采式的深邃。

由於曹聚仁的「史識」，書中時時閃現他獨特的見解。例如他對魯迅與「論敵」的對罵，他是持諒解的態度，他認爲這些性格弱點與魯迅幼年所處環境有關，「大約一受刺激，便心煩，事情過後，即平安些」，也不必苛求。對於魯迅與左聯的關係，曹聚仁不同意魯迅領導了「左聯」的說法，認爲是魯迅以他的堅不可摧的精神力量、社會地位和鬥爭意志支撐了「左聯」，所以由此得出的結論是：「『左聯』依靠著魯迅，而不是魯迅領導『左聯』。」另外由於曹聚仁本身是雜文隨筆大家，因此他對雜文這一新生文體的價值與意義，有獨到的體悟，他也特別看重魯迅後期的雜文。他認爲魯迅的雜文「十分圓熟，晶瑩可愛」，「晚年所寫的雜文，量既很多，質也很好，也可說是他創作欲最旺盛的時期」，「就批評現實的匕首作用說，晚年的雜文自是強勁有力。但要理解他的思想體系，說得完整一些，還得看他的幾篇長的論文和講稿的。」他甚至肯定那些曾被人貶低的《偽自由書》和《准風月談》兩書



的〈後記〉，他說道：我們現在看「那兩篇長長的〈後記〉，就可以瞭解他當時所處的環境，以及他那些雜感文所激起的反應（若不重看他的〈後記〉，幾乎記不起當年文壇一些重大的事故了）。」

晚近的魯迅研究者張夢陽在評曹著時，認為曹聚仁強調魯迅作品時，要「撇開票面（表面）來找尋他的本質」，是極有見地的。因為「不可以呆看」，正是理解魯迅及其作品的重要原則。另外由於曹聚仁與魯迅有過極深的交往，加之曹聚仁的感悟能力，使得他對魯迅性格特徵及形成原因的把握，較其他傳記作者，更準確而具象。倒如他說：「時人都認為繼承章太炎的文統的是黃侃，其實黃氏古文，只是貌似，得其神理莫如魯迅。」又說：「孫伏園氏，說到魯迅思想，受托爾斯泰、尼采的影響，『這兩種學說，內容原有很大的不同，而魯迅卻同受他們的影響；這在現在看來，魯迅確不像一個哲學家那樣，也不像一個領導者那樣，為別人瞭解與服從起見，一定要將學說組成一個系統，有意的避免種種的矛盾，不使有一點罅隙；所以他只是一個作家、學者，乃至思想家或批評家。』所以，一定要把魯迅算得是什麼主義的信徒，好似他的主張，沒有一點不依循這一範疇，也是多餘的。馬克思學說之進入他的思想界，依然和托尼學說並存，他並不如一般思想家那麼入主出奴的。」「魯迅的思想、性格，正有著叔本華的影子」。曹聚仁認為魯迅愛好赫胥黎《天演論》、篤信尼采學說是相反而實相成以及叔本華、尼采的個人主義哲學和道家哲學相通、托爾斯泰的大愛主義實出於佛家思想等等論斷，都有著他的獨特之見。另外曹聚仁還以重筆評斷魯迅與「革命文學」之爭端，他說魯迅「在那革命狂潮中，他的話似乎平淡的很；到今天看來，他才是真正

有遠見，看到了所謂激進份子的開倒車。」這是因為「他對於過去的幻滅，對於現實的悲觀，乃是從苦痛的經驗中得來，並非脫口而出，而對將來的『樂觀』，取保留的態度，正視現實，不做樂觀空洞的想法。人類，離開理想社會的出現，還遠得很；『失望』之為『虛妄』，與『希望』同；魯迅本來認為『希望』也是『虛妄』的。革命家過份樂觀，過份把天下事看得十分容易，每每操之過急，反而變成『徒善不以為政』的。我覺得魯迅的反擊頗有力量，而且最踏實的。」論者認為八〇年代末期，魯迅研究領域出現了「反抗絕望」的命題，其實早在三十多年前，曹著中就已談到這點了。

當然，曹著也並非完美無缺。張夢陽就認為「其主要局限是作者的理論水平不夠高，看人看事又離得過近，不能從宏觀的歷史發展中審視魯迅的價值，因而有時在局部事實上可能是真切的，從歷史全景中看，就失之偏頗了。」。雖是如此，曹聚仁的魯迅研究，儘管有「謬託知己」的失誤或不盡如人意的地方，但他的研究仍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。周作人就曾經三次向曹聚仁索要《評傳》一書，在他給曹聚仁的信中說：「魯迅評傳，現在重讀一遍，覺得很有興味，與一般的單調書不同，其中特見尤為不少，以談文藝觀及政治觀為尤佳，云其意見根本是『虛無主義』的，正是十分正確。因為尊著不當他是『神』看待，所以能夠如此。尊書引法郎士一節話，正是十分沈痛。常見藝術家所畫的許多像，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，沒有寫出他平時好的一面，良由作者皆未見過魯迅，全是暗中摸索，但亦由其本有戲劇性的一面，所見到的只是這一邊也。」在這一方面言之，曹聚仁無疑的有「史家之筆」了。